



他者的城市：香港  
——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

刘晓娴

LOW SIEW HAN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NOVEMBER 2011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他者的城市：香港

### ——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刘晓娴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教师：贺淑芳 师

呈交日期：25/11/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2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5
第二章 香港：从殖民到后殖民	10
第一节 炮声下的“割让”：殖民命运的肇始	10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的香港面貌与文化地位	12
第三章 张爱玲与香港：一位上海姑娘的“港岛奇缘”	16
第一节 机缘巧合的香港经历	16
第二节 为上海人打造的“香港传奇”	22
第三节 张爱玲的后殖民意识	26

第四章	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	30
第一节	作为一个“被看”的“他者”·····	30
第二节	“避难之城”与“欲望之都”的形象·····	37
第三节	从上海到香港：新生抑或延续？·····	41
第五章	另一幅图像：张爱玲笔下驻留香港的白人社会·····	46
第一节	白人社会对“性话语”的封闭·····	46
第二节	白人社会的冷漠·····	50
结论	·····	54
参考书目	·····	56

他者的城市：香港

——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日期：

## 摘要

本文的重点在于尝试从文学文本对一座城市进行解读。笔者选择以张爱玲书写香港的文本为对象，从后殖民叙事研究出发，结合相关的理论成果，探讨其笔下的香港都市图像，找寻香港的后殖民特征。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前言，主要说明研究动机、研究难题，概述研究方法，以及分析相关课题的前人研究成果。第二章主要以香港为重点，以其割占历史起首，简述《南京条约》签订的前后因果，为本文开篇作一铺陈。其后进一步关注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张爱玲笔下的香港，即约 1930 至 1940 年代的香港面貌与文化地位，藉此寻找彼时代的香港与张爱玲作品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则将焦点放在张爱玲身上，探讨其香港经历以及为对其作品中有关于香港的文本作一梳理。与此同时，由于本文涉及后殖民论述的研究，因此亦会探讨张爱玲创作中的后殖民意识，阐明其作品如何与后殖民论述挂钩。

第四张及第五章将进入文本分析及探究的部分。第四章的主线为“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亦即本论文的探讨重点。此章由三个要点组成：一、作为一个“被看”的“他者”；二、“避难之城”与“欲望之都”的形象；三、从上海到香港：新生抑或延续？分别探讨了香港在张爱玲笔下所呈现出的

身份地位、形象以及其在新旧文化冲突下的定位。第五章则以张爱玲涉及香港白人社会的文本进行探究，窥睹此族裔在其笔下的面貌。



## 致谢

写致谢词的这一刻，也是我的论文宣告完成的时候了。回首过去无数个熬夜的日子，黑眼圈一层一层的加深，终于可以跟自己说：完成了！感谢贺淑芳老师一直以来的指导，犹记得您说的那句“做论文没有捷径”，还有您细心、温和的指教，让茫然的我找到了方向。老师，谢谢您！

感谢我的家人。眼看我每天熬夜做论文的妈妈，感谢您的鼓励和不时为我准备的爱心鸡精，感谢老爸总是在拨电回家时挂心我有没有好好休息，以及在外地工作的姐姐们，谢谢你们们的温馨关怀。在准备论文的这段时期也多得正在应考的妹妹相伴熬夜，让我不孤单，遇到难题时还能找人说说话，所以，有你们我真的很幸福！

感谢这三年以来曾经指导我的老师们，你们的教诲我会铭记于心。也谢谢身边曾经帮助我的朋友，能认识你们真好！

诸位，感恩。

## 第一章 引言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一位正值花信年华的女作家腾空出世，以其独有的自制的“沉香屑”，点燃了她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也点燃了整个上海文坛，阵势惊艳四座，顿时无人不把目光投向她——张爱玲。紧随着登场的〈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作品同样得到极高的评价，让她站在了上海文坛的顶峰。回首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发现她最初着笔的皆为香港题材小说，而在她笔下的这些香港故事，虽说不上是为香港“树碑立传”，却让我们窥见了于她那个时代的香港面貌。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深入阅读张爱玲叙写香港的作品，即会察觉其中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亦会与余斌产生共鸣：“张爱玲的香港传奇比她的上海传奇带有更多‘怪力乱神’的成分”<sup>1</sup>。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告诉了我们她持有的“上海说书人”身份，她的“香港传奇”是为上海人而写的，“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sup>2</sup>。笔者对其所言深感疑惑，上海人的观点是什么？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能看到些什么呢？

此外，让笔者感兴趣的也在于张爱玲的“后殖民意识”。从张爱玲书写香港的作品可发现其中有许多与后殖民特点挂钩的地方，而追寻她写作的年代，

---

<sup>1</sup> 详见余斌：《张爱玲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226。

<sup>2</sup> 详见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57。

实际上未出现后殖民的相关研究，这不禁让笔者诧异，张爱玲是否具有“先知先觉”的后殖民意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张爱玲叙写香港的故事，我们从中得到什么讯息？当时的香港面貌又反映了什么？怀着如此的研究动机，本文选择从文学文本对一座城市进行解读的尝试，以张爱玲书写香港的文本为对象，从后殖民叙事研究出发，结合相关的理论成果，探讨其笔下的香港都市图像，找寻香港的后殖民特征。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with 难题

本文主要采纳后殖民论述与文本细度法来解读及分析张爱玲书写香港的文本，试图探讨香港在其笔下所呈现出的都市图像。

关于后殖民 (post-colonial 或 postcolonial) 一词，根据张京媛的说法，后殖民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即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另一个含义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sup>3</sup>然而张京媛进一步指出第二个含义是有争议的，因为“如果说殖民主义是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话，那么我们的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越殖民主义。”<sup>4</sup>斯皮瓦克则认为，后殖民的“后”不一定是指“之后”的观点，“后”往往是因为故有的殖民影响，产生出两种社会文化的接触，因而不一定是指向历史时序上的“之后”。由此可见，后殖民的含义可谓复杂难解，但一般上都认为它并不在于指示殖民主义的真正完结。

---

<sup>3</sup>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1。

<sup>4</sup>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页 1。

后殖民主义理论集中关注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sup>5</sup>它强调文化问题，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概括，因此也被称为“文化殖民主义”（cultural colonialism）。据张京媛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指出，后殖民理论的一些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批判东方主义：东方主义的概念主要由萨义德在其 1978 年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sup>6</sup>中提出。所谓的东方主义并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它是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之上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西方统治、重新建构和支配东方的话语；二、文化身份：身份不是由血统所决定，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对于文化身份认同，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是族裔散居（diaspora）的问题，其中如“中国性”（Chineseness）的出现及其意义；三、对被殖民者的分析：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四、对民族主义的探讨：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sup>7</sup>

细读（Close reading）是由 20 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所主张并贯穿始终的批评精神和方法。细读，指对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评论，评论者在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张力等方面中显示文本的语义。<sup>8</sup>英美新批评家主张认真、审慎、反复、仔细地研读原文，从词、词组、词意及其关系中把握和解释原文及其意义，反对以一种先验的意识和理论介入作品，使词意等得不到一种文学性的展

---

<sup>5</sup>陶东风：《后殖民主义》，台北：扬智文化，2000，页 3。

<sup>6</sup>有译者将 *Orientalism* 译为《东方学》，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sup>7</sup>关于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均参考自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页 5-8。

<sup>8</sup>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 150。

示，提倡“就事论事，就文论文”式的“纯批评”。<sup>9</sup>笔者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文本细读是备受重视的一环，因为直面文本方为把握文本最重要的途径，诚如陈思和所言：“文本细读是一种能力，它可以帮助你阅读文学名著，帮助你透过文字或者文学意象，达到作品隐蔽的精髓之地。”<sup>10</sup>笔者选择以细读法作为研究方法之一是在于避免一味的陷入前人的评论和解说中，因而对文本的理解和想像受到束缚。

着重文本细读的陈思和曾说：

……到现在 20 年过去了，一届届的研究生都被笼罩在宏观体系理论的阴影里，虽然在理论上也能自圆其说，但心里总是虚的，没有充分的阅读文学原著，理论底气很难会充足。<sup>11</sup>

由此可见，以理论介入文本并非不可的事，然而在套用这些理论前，最重要的莫过于直面文本，细读文本。本文主要以张爱玲所言之“香港传奇”，即〈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旁及其他以香港为背景或她曾书写香港的作品为探讨文本。本文也将参阅张爱玲的传记、散文集等相关作品，以其作为参照材料，试图勾勒出张爱玲笔下的香港都市图像。

---

<sup>9</sup>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页 150。

<sup>10</sup>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 10。

<sup>11</sup>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页 10。

关于张爱玲与后殖民的研究虽算不上繁盛，但其中一些较明显的特点已在前人的研究中被挖掘出来，要在其中寻求突破成为了一大难题。其次，本论文的研究难题也在于理论上的运用，笔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常会碰到如何精准的融合理论于分析工作中的困难。此外，笔者亦面对规划论文架构的问题，在论述中常出现重点过于散乱的情形。再者，学校关于香港及后殖民研究方面的资料还是相当缺乏，其中一些较著名的著作如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也斯的《香港文化》等皆未有收入，造成在探究的过程中不时会遇到参考资料匮乏的问题。

###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张爱玲自 1955 年远赴美国后，其名声顿然在文坛上失去了光芒，直至 1961 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的面世，评价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sup>12</sup>，霎时引起众人对这位红极一时的女作家重新展开认识、深究。肖进在《旧闻新知张爱玲》一书中指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张爱玲的研究与论述之“多”与“盛”，已经形成与鲁学、红学、钱学相并立的“张学”。海内外相关的论文、著作，不说汗牛充栋，也足以蔚为大观。各种各样的论述话语，从宏大叙事到文本分析，从女性主义到后现代批评、以至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都在张爱玲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sup>13</sup>

---

<sup>12</sup>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页 254。

<sup>13</sup> 肖进：〈后记〉，《旧闻新知张爱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 179。

“张爱玲热”的升温让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及评价张爱玲与其作品，后殖民研究也在其中扎上一脚。

张小虹的〈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是其中一篇涉及张爱玲与后殖民研究的文章。文中以“恋物”和“恋物化”为理论框架，从精神分析学的“性恋物”，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及（后）殖民研究的“殖民凝物”三方面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恋物”成分。<sup>14</sup>在“殖民凝物”的部分，作者解析出张爱玲笔下的“东方主义式凝视”（the orientalist gaze）：

在“东方主义式的凝视”（the orientalist gaze）之下，西方看不见东方，只看见自己欲望投射出去，结合了“异国”（the exotic）与“异色”（the erotic）的东方色彩。<sup>15</sup>

她认为，“张爱玲对帝国殖民主义的反思，不在于义正辞严的反霸反帝，而在于呈现殖民主体（包括外国人、杂种人、中国人）本身内在的精神分裂与不稳定性。”<sup>16</sup>她进一步指出，张爱玲笔下的殖民纠结，是在于“旧中国”与“新西方”二者的杂糅，因此有必要强调“文化杂种”的观念。

“文化杂种”指的不是中体西用，也非全盘西化，而是“华洋杂处，新旧掩

---

<sup>14</sup>张小虹著，杨泽主编：〈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麦田出版，1999，页178。

<sup>15</sup>张小虹著，杨泽主编：〈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178。

<sup>16</sup>张小虹著，杨泽主编：〈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198。

映”的叠合交缠。<sup>17</sup>

文中作者以张爱玲描绘的杂种女人为例，揭示了女人即便沦为交易商品，“也是有种族区隔的殖民布局”<sup>18</sup>。

另一篇以后殖民视角探究张爱玲与其创作的，是蔡源煌的〈从后殖民主意的观点看张爱玲〉一文。此文以张爱玲的数篇中短篇小说为对象，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思考的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反对型后殖民思考”，指的是第三世界作家对欧洲中心论、白人至上论的颠覆；另一种是“共犯型后殖民思考”，指在殖民地时代或殖民地独立之初，接受殖民者的价值观。<sup>19</sup>在张爱玲的笔下，他发现，那些“殖民时代、租借时代的人物，再怎么可憎可恨，都是历史定命论低下的受害者，悲剧色彩浓厚。”<sup>20</sup>

此外，梁秉钧在〈两类型的殖民论述：黄谷柳与张爱玲笔下四十年代的香港〉一文中，以两位 1940 年代的作家——黄谷柳与张爱玲为对象，结合殖民话语的角度，探讨彼时代的香港小说中所呈现的殖民现象。文中言明将两人的作品视为“各种文化与政治势力互相角力、补充及渗透的场域”<sup>21</sup>来进行讨论。梁秉钧指出，黄谷柳的小说透露出的是一种由殖民地主义带来的压迫感，

---

<sup>17</sup> 张小虹著，杨泽主编：〈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202。

<sup>18</sup> 张小虹著，杨泽主编：〈恋物张爱玲——性、商品与殖民迷魅〉，《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202。

<sup>19</sup> 蔡源煌著，杨泽主编：〈从后殖民主意的观点看张爱玲〉，《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280。

<sup>20</sup> 蔡源煌著，杨泽主编：〈从后殖民主意的观点看张爱玲〉，《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285。

<sup>21</sup> 梁秉钧：〈两类型的殖民论述：黄谷柳与张爱玲笔下四十年代的香港〉，《作家》2003 年第 22 期，页 32。



暗示着“返回国家领土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法”<sup>22</sup>；然而对于张爱玲，殖民主义不仅仅显现在被殖民者的精神状态上，“它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见于殖民地统治者的心理处境上”<sup>23</sup>，所以她的小说中还吐露了对殖民者的同情，像〈沉香屑：第二炉香〉<sup>24</sup>中对男主人公罗杰的悲惨遭遇的描写。

程悦的〈他者之城：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传奇”〉一文，将探讨对象限定于张爱玲的香港题材小说，研究张爱玲与香港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文章提出了在张爱玲的笔下香港作为“一座丧失了自性的城市”<sup>25</sup>的论点，它扮演的是“双重他者”的角色：对于西方殖民者而言，香港成了为满足殖民者的期待视野而被刻意制造为被看的“他者”——“伪东方”；而在从中国内陆来的上海人眼中，香港亦是作为远方异在的一个“他者”而存在的。<sup>26</sup>程悦另有一篇〈再生之城：完不了的“香港故事”——试论张爱玲与施叔青笔下的香港传奇〉，以张爱玲与施叔青为比较对象，探讨两者的香港题材小说。此文将研究重点归纳为：殖民史——女性命运、认同危机、末世忧思及物化生存真相，<sup>27</sup>窥探两位女作家在香港书写中呈现的殖民地色彩及由此形成的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焦虑、困惑。

再者，蔡秀粧（Hsiu-Chuang Deppman）的〈重写殖民遭遇：张爱玲与萨默赛特·毛姆〉亦运用了后殖民视角解读张爱玲与毛姆的作品。文章以张爱玲的

---

<sup>22</sup>梁秉钧：〈两类型的殖民论述：黄谷柳与张爱玲笔下四十年代的香港〉，页 42。

<sup>23</sup>梁秉钧：〈两类型的殖民论述：黄谷柳与张爱玲笔下四十年代的香港〉，页 42。

<sup>24</sup>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88-125。

<sup>25</sup>程悦：〈他者之城：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传奇”〉，《华文文学》2004 年第 1 期，页 31。

<sup>26</sup>程悦：〈他者之城：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传奇”〉，页 31。

<sup>27</sup>详见程悦：〈再生之城：完不了的“香港故事”——试论张爱玲与施叔青笔下的香港传奇〉，《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卷第 3 期，页 9-11。

〈桂花蒸 阿小悲秋〉（英译版为“Indian Summer”）及毛姆的《哨所》（The Outstation）为对象，探讨其中的视角建构及东方主义的问题。<sup>28</sup>作者指出，这两部小说均关注了殖民文化的“单中心”视角，显示出殖民者在远东的“位置”已被讽刺性的扭曲和取代。<sup>29</sup>

龚文华《后殖民批评视阈中的张爱玲》一文采用了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方法，以东方主义、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女性命运为切入点，揭示出张爱玲第一个时期（40年代的上海创作时期）的作品中的后殖民主义特征。<sup>30</sup>文中对张爱玲的反殖民凝视书写作出探讨，提出“颠覆”与“模仿”的方式。另外，论者从民族文化及民族语言的角度探究张爱玲的反殖民书写模式，指出她以母语写作，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刻画等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营养，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民族文化精神，<sup>31</sup>从而展现了对殖民统治的颠覆性书写。文章也从张爱玲的作品分析殖民地女性的命运。

综观上述，结合后殖民视角与张爱玲作品的相关研究可说是已具雏形，同时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注意，各学者的切入点也有所不同且具有独特性。

---

<sup>28</sup> 原文为 This essay will examine these two particular issues --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pective an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Orientalism -- through a close-reading of two of their short stories, Maugham's "The Outstation" and Chang's "Indian Summer." Hsiu-Chuang Deppman, *Rewriting Colonial Encounters: Eileen Chang and Somerset Maugham*. *Jouvert*, 5(12).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chass.ncsu.edu/jouvert/v5i2/hcdepp.htm>

<sup>29</sup> 原文为 Both stories call attention to the monocentric view of the colonial cultural practice and account for the displacement of a colonizer's "place" in the Far East with an ironic twist. Hsiu-Chuang Deppman, *Rewriting Colonial Encounters: Eileen Chang and Somerset Maugham*. *Jouvert*, 5(12).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chass.ncsu.edu/jouvert/v5i2/hcdepp.htm>

<sup>30</sup> 龚文华：《后殖民批评视阈中的张爱玲》，武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4。

<sup>31</sup> 龚文华：《后殖民批评视阈中的张爱玲》，武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25。

## 第二章 香港：从殖民到后殖民

香港的殖民历史也许是很多人不愿提及的伤疤，然而欲对香港进行解读，就有“回到过去”的必要。重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更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往，亦能更深刻的思考关于殖民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及影响。本章将从香港如何割让予英国起首，重拾旧日的史事，再进一步关注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张爱玲笔下的香港，即约 1930 至 1940 年代的香港面貌与文化地位，藉此寻找这时代的香港与张爱玲作品之间的联系。

### 第一节 炮声下的“割让”：殖民命运的肇始

香港是散布在珠江入海口的数百个岛屿之一。在清朝（1644-1911）时期的中国地图上，香港这一个地区不是被忽略就是无法辨认，它在 1760 年出版的一张海图上首次被标出，但只绘出了该岛的西部海岸。随后，东印度公司所属“约克”号（York）的乔治·海特（George Hayter）船长亦绘制了一张海图，然而其中误差甚多，现今维多利亚港的水深虽已被标出，锚地却错误的标于索罟群岛南端一个毫无遮蔽的地点。此海图虽显粗略，但值为一提的是，海特船长记录下了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称。<sup>32</sup>由此可见，清朝时期的香港纯属是一个毫不起眼甚至被“错置”的岛屿，然而这一个不受瞩目的岛屿如今已成为了经济发达、繁荣绚丽之地。

---

<sup>32</sup> 参考自[英]弗兰克·韦尔什著，[中国]王皖强、黄亚红译：《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 by Frank Welsh,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3），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中译本，页 19。

英中两国早于 17 世纪已有贸易来往。到了 19 世纪初期，英国为了克服贸易逆差的问题，将鸦片大量引进中国，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林则徐被授以钦差大臣之职，背上杜绝鸦片来源之重任，执行了史称“虎门销烟”的壮举。后来发生了中国人林维喜被英国水手殴毙事件，林则徐执意要求英方交出一人顶罪，但遭到当时的驻华公使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的拒绝。林则徐随即采取行动，封锁澳门，不准英人逗留。<sup>33</sup>中英两方的冲突最终升级成战争，英国于 1840 年 6 月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装备落后、指挥失当的中国军队成为败将。

1841 年 1 月 7 日，英军突袭虎门的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两广总督琦善在胁迫下，于同月 20 日与英国代表义律定下《穿鼻草约》，内容包括中国须赔偿 6 百万银元和割让香港，但此口头协定事前未获中英两国政府同意。<sup>34</sup>1841 年 1 月 26 日，英舰“硫磺”号（HMS Sulphur）舰长拜尔秋（Edward Belcher）在香港岛升起英国国旗，义律单方面实行了《穿鼻草约》，宣布占领香港。随后取代义律之职的亨利·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在来到中国后即刻扩大了对华的战争侵略。1842 年 8 月初，英军兵临南京下关江面，中国人被迫与英国人进行谈判，当时清政府派出的代表为伊里布与耆英。最后双方于 8 月 29 日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割让予英国。

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

---

<sup>33</sup>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页 39。

<sup>34</sup> 陈天权：《香港历史系列——穿梭今昔 重拾记忆》，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页 11。

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sup>35</sup>

一个条约的签订，香港自此开始了它作为殖民地的命运。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sup>36</sup>的香港面貌与文化地位

1842 年英国在香港岛建立殖民统治之时，英国人只考虑在远东的军事及商业利益，没有意图开发这个简朴荒凉的小岛，只是按照一贯的殖民地政策进行各种部署，<sup>37</sup>较主要是军事上的部署及让英商建民房、货仓和码头，以保障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及增强武装实力。至于香港的城市发展，英国并没有刻意的规划或拟定某些政策，倾向于“随意性”的发展形态。1860 年，九龙半岛割让予英国。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因中国的失败而掀起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趁机偷袭，于 1898 年逼迫清政府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安县深圳河以南、英属九龙以北，后称“新界”的大幅土地。<sup>38</sup>自此便形成了今日的香港版图。

冼玉仪在分析了香港开埠初期的社会状况后下的结论是：“从人口、经济活动和城市发展来说，1841 年后的香港可以说是从外面移植到来的社会，而不

---

<sup>35</sup> 取自乔还田、晋平：《国门破毁之始：南京条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页 146 - 147。

<sup>36</sup> 本文以 20 世纪上半叶为论述界线主要在于配合探讨对象张爱玲笔下的香港时期，即 1930 至 1940 年代。

<sup>37</sup> 龙炳颐著，王庚武主编：〈香港的城市发展和建筑〉，《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1997，页 220。

<sup>38</sup> 高添强：《香港今昔》新版，香港：三联书店，2007，页 134。

是从原有的渔农社会衍生出来的。”<sup>39</sup>王瑞华则说香港的文化“是被割占后，随着殖民者的殖民统治的建立与大量中国移民的到来横向移植的。一方面是来自内地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随着市民阶层的移民自然而然地带来的；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并被强制推行的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硬生生地在香港碰撞、配合、短兵相接。”<sup>40</sup>两位学者的观点中不谋而合的提及一个字眼：“移植”，香港不存在悠久的历史文化，西方文化算不上是一种新文化对旧有文化的入侵，这种形态又为香港增添了更独特的身份。无论如何，香港的殖民身份是无可否认的，这也决定了它成为一个中西文化汇聚，甚至是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

开埠以后，除了英国和欧美人士外，其他族裔人士亦相继来港谋生或寻找商业发展的机会，他们包括葡裔、印裔、犹太裔，还有巴斯（Parsee，亦称帕西），以及一些来自中亚地区和日本的商人，<sup>41</sup>致使香港呈现一片“华洋杂处”的局面。这个特色亦多次展现在张爱玲的香港题材小说中，像《连环套》<sup>42</sup>里赛姆生太太好几任不同族裔的丈夫，生下不同族裔的混血儿，或像《倾城之恋》<sup>43</sup>中身上集合了七八种血液的周吉婕，可见多元族群在香港形成的明显特点。

虽常说香港是“华洋杂处”之地，但早期香港社会实行的其实是华洋分隔的政策。关于华人的住处和设施问题，港英政府是一副放任自流的态度，只消

---

<sup>39</sup> 详见洗玉仪著，王赓武主编：〈社会组织与这会转变〉，《香港史新编》上册，页 157-158。

<sup>40</sup> 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页 224-225。

<sup>41</sup> 高添强：《香港今昔》新版，香港：三联书店，2007，页 134。

<sup>42</sup> 张爱玲：〈连环套〉，《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12-78。

<sup>43</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188-231。

不冒犯英国人利益，他们一概不会干涉。而在族群的地理分布上，政府还采取了分区而居的方针，华人与其他族群的聚居地形成了一条“分隔线”。港府认为华裔的唐楼（中国式房屋）卫生条件恶劣，若中西式房子并列，西人的健康会受到不良影响，<sup>44</sup>而中西人士的生活方式、观念、语言亦有所不同，比邻而居只怕产生摩擦的几率更大，故将他们分隔开来。步入 20 世纪以后，这种“隔离政策”仍未终止，港府规限山顶为欧人住宅区，立法局还于 1904 年通过《山顶区保留条例》，意图防止华人越界。<sup>45</sup>这种政策的实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英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这种种现象在张爱玲笔下无疑化成了殖民地当中的两种身份地位，而华裔总是处于低等、被打压的一方。

对于香港的城市发展，龙炳颐曾提出如此的观点：

香港不过是殖民政府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此注定无法与法国的巴黎、美国的华盛顿，中国的上海和北京等一些在有国家观念、有文化观念的基础上，配合地理环境而发展的城市作比较。<sup>46</sup>

对于港英政府而言，香港终究是一个作为商业用途的殖民地，开埠以后逐个实行的工程，如填海增地、道路开拓、等大多是因社会及经济发展需求而展开，即使有规划性也显得“只有功利目的而没有社会理想及文化取向”<sup>47</sup>。对于来自上海的张爱玲，将近 3 年的香港生活必然会与她居住了颇长时间的上海形成对

---

<sup>44</sup>丁新豹著，王庚武主编：〈历史的转折：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演进〉，《香港史新编》上册，页 105。

<sup>45</sup>陈天权：《香港历史系列——穿梭今昔 重拾记忆》，页 59。

<sup>46</sup>龙炳颐著，王庚武主编：〈香港的城市发展和建筑〉，《香港史新编》上册，页 213。

<sup>47</sup>龙炳颐著，王庚武主编：〈香港的城市发展和建筑〉，《香港史新编》上册，页 213。

比，在她的笔下香港总是呈现一幅不调和的景象，回到上海后她更发出了“到底是上海人”<sup>48</sup>的感叹。

要探究殖民地文学，毫无疑义，香港是一个典范性对象；而随着后殖民叙事研究的广泛流行，香港无疑也是后殖民论述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关于香港的后殖民叙事脉络，朱耀伟曾指出，“在许多后殖民国家（如非洲诸国）中，后殖民国族论述是以乡土作为建构本土论述的据点，但香港这个后殖民城市，在殖民时期已经发展成比其殖民者先进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香港未如其他后殖民地般，有独有的殖民前文化，乡土变得难以作为本土论述的主要课题。”<sup>49</sup>在如此的特殊情况下，香港的本土论述似乎就以城市取代了乡土。

---

<sup>48</sup>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55。

<sup>49</sup> 朱耀伟著，张美君等编：〈小城大说：后殖民叙事与香港城市〉，《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页 255。



### 第三章 张爱玲与香港：一位上海姑娘的“港岛奇缘”

凭着独到的见解，精当的分析，张爱玲写出了一个个精彩的香港故事，也刻画出香港作为殖民地的种种“异国情调”，而在这些故事的酝酿过程中，自身的香港经历更是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对于张爱玲必然是个新鲜且陌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她碰上了港战和沦陷，她也曾说战时的所见所闻予她“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sup>50</sup>，相信这带给她的震撼力是极大的。这种切身体验必会牵绊着她的创作思路，所以了解其香港经历，应有助于更深入探究其叙写香港的作品。有鉴于此，本章将通过张爱玲的传记及散文概括出她到香港求学的经历，同时对其作品中有关于香港的文本作一梳理。由于本文涉及后殖民论述的研究，因此亦会探讨张爱玲创作中的后殖民意识，阐明其作品如何与后殖民论述挂钩。

#### 第一节 机缘巧合的香港经历

##### 求学岁月

1939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sup>51</sup>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办的招生考试，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她的求学生涯改变了路线，她改入了香港大学就读。这段求学的日子，张爱玲说自己是“真的发奋用功了”，而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sup>52</sup>认真勤奋的她在二年级时以全年级第一的分数独得了学校的两项奖学金，可全免学费及

<sup>50</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1。

<sup>51</sup> 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108。

<sup>52</sup> 张爱玲：〈我看苏青〉，《余韵》，香港：皇冠出版社，2000，页83。

膳宿费，毕业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据她说，有一位教授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来没给过她给她的分数，<sup>53</sup>可见其成绩之优异。

张爱玲曾透露，她在香港念书期间“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sup>54</sup>，可见其不凡的英语造诣都是靠自己苦修得来的。她对于西方文化、历史及文学方面的知识相信也是在这三年里积累下来的。在港大的日子，除了知识上的积淀，张爱玲在友情上也有收获，那就是认识了她的终生挚友——炎樱<sup>55</sup>。这两个女生，如余斌所言，一个是“冷漠好静好独处”<sup>56</sup>，一个则是“热情好动好热闹”<sup>57</sup>，性格可谓大相径庭，但生性孤僻的张爱玲却喜与活泼多话的炎樱相伴。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人有着许多同好，像绘画、时尚服装、文学等都是她们所热衷的。透过炎樱向她介绍的一位帕西人朋友<sup>58</sup>，她知道了关于这位帕西人和他前妻宓妮的故事，并从中找到了创作《连环套》的灵感。

---

<sup>53</sup> 张爱玲：〈我看苏青〉，《余韵》，页 83。

<sup>54</sup> 张爱玲：〈存稿〉，《流言》，页 132。

<sup>55</sup> 据张爱玲的解说，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母亲则是天津人。详见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页 56。

<sup>56</sup> 余斌：《张爱玲传》，页 226。

<sup>57</sup> 余斌：《张爱玲传》，页 226。

<sup>58</sup> 张爱玲在《张看》的自序中记述了这件事。这位帕西人是炎樱父亲的老朋友，还在港大念书时，有一次他请炎樱看电影，炎樱硬拉着张爱玲一块去。据张爱玲解说，当炎樱向他介绍自己时，他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气，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向炎樱手里一塞，只咕哝了一声“你们进去”，就匆匆地往外走。炎樱急忙叫着他再补一张票就行了，但他只摆了摆手，临走前往她手里塞了一只装着煎面包的纸包。炎樱解释这是因为他只带了足够买两张票的钱，最后剩下她们俩进场看电影，可能是心觉过意不去，两人中途便退场了。详见张爱玲：〈自序〉，《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6-7。

## 港战体验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入香港，张爱玲的学生生活被迫中断，毕业后到英国深造的计划也被打翻。根据张爱玲的回忆<sup>59</sup>，当时一颗炸弹掉在宿舍隔壁，她和同学们躲到宿舍的最下层，她犹记得在那“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sup>60</sup>关于本身对战争的心理反应，张爱玲自己没有明说，但是有关于“我们”的描写，多半也应是她自己心理的写照，<sup>61</sup>她说“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sup>62</sup>她也表明“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睬”<sup>63</sup>，显然有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港大因战争停止办公，张爱玲和其他来自异地的同学被迫离开宿舍，为了解决宿膳问题，他们选择参加守城工作。到防空总部报了名出来的他们遇上空袭，她经历了惊险的一幕：“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sup>64</sup>如此的经历对于张爱玲必定是印象深刻的，就像是一个人近距离面临着死亡，笔者猜想，或许白流苏经历的“倾城”正是这个记忆的重现。战争中另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是她的历史教授佛郎士的死。

---

<sup>59</sup> 本文关于张爱玲在港战时期的学习与生活多取材于〈烬余录〉一文。详见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1-54。

<sup>60</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4。

<sup>61</sup>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页107。

<sup>62</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3。

<sup>63</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3。

<sup>64</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4。

守城工作并没有真正解决膳食问题，像张爱玲做防御工作的只分到米和黄豆，但无油亦无燃料，她或许也不善料理，就这样连接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sup>65</sup>。回忆起围城体验，她如此描述道：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sup>66</sup>

饥饿的体验对她而言可能不算什么，灾难底下人的空虚与绝望才是让她铭心刻骨的。她目睹了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情况而急于抓住一个踏实的依靠，那就是结婚。一对男女到他们的防空处办公室来借汽车去领结婚证，来了好几次，每次都得上数小时，但他们总是“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sup>67</sup>，把大家也逗笑了。忆起这事的张爱玲说“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sup>68</sup>。笔者相信，这个情景是触动了张爱玲的心灵的，她也许觉得这种匆匆的婚姻是逃避虚空和绝望的方式，但同时也对他们有着同情的理解，至少她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快乐，说不定白流苏与范柳元的故事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灵感。

---

<sup>65</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6。

<sup>66</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7。

<sup>67</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7。

<sup>68</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7。

## 沦陷经历

18 天后战争结束了，实际上是沦陷了，但张爱玲说，大家都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中，因为“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sup>69</sup>她还记得当时和同学们怎样满街的寻找冰淇淋和嘴唇膏，并自称自己“从那时候起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sup>70</sup>。困在沦陷中的外埠学生则无事可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sup>71</sup>——张爱玲特别表明这不是普通的学生调情，而是让医院院长担忧会否有“战争小孩”出现的这种调情。张爱玲对这些现象做了一个结论：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sup>72</sup>

她对人类文明所谓的“进步”产生了怀疑，余斌认为这种怀疑态度成为了她“张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个稳定的视角，她总是能够发现现代人的机智、装饰后面的空虚。”<sup>73</sup>

休战后张爱玲和同学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当看护，面对的都是战争中中了流弹的伤者和被击伤的乘火打劫者，张爱玲形容他们是“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sup>74</sup>她有时要上

---

<sup>69</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47。

<sup>70</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48。

<sup>71</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3。

<sup>72</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3。

<sup>73</sup> 余斌：《张爱玲传》，页 61。

<sup>74</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0。

十个小时的夜班，病人多半在深夜死去。<sup>75</sup>有一个屍骨生了蚀烂症的患者，因为痛苦无比总是整夜的呻吟着，张爱玲对他是置之不理的。后来这个人终究是死了，张爱玲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sup>76</sup>

一种看似淡然的语气透露了人性的冷漠、自私，但在这冷漠下似乎还隐藏着一种恐惧感。张爱玲说她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sup>77</sup>，也许对于当时年纪尚轻的她而言，生命不应该是如此的，这种凄厉的生命予她是一种折磨，亦是一种恐惧。

其时张爱玲还画了许多图画，她说是“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sup>78</sup>。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十分欣赏的，甚至觉得不像是自己画的，“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sup>79</sup>。另一边厢她却说：“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那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sup>80</sup>这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种“惘惘的威

---

<sup>75</sup>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页 113。

<sup>76</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0。

<sup>77</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0。

<sup>78</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2。

<sup>79</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2。

<sup>80</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52。

胁”的气息，朝不保夕的日子让她感到任何事都会在一瞬间改变，而人的生命更是无比的脆弱，也许从这个教训中她也得出了“出名要趁早”的这个想法。

战争把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毁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对此张爱玲似乎有点无奈：“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sup>81</sup>后来她更承认，在香港三年于她有益的“也许还是偷空的游山玩水，看人，谈天”<sup>82</sup>，此话大概是对其创作而言的，影响她最深的还是与大自然、社会的接触。1942年的夏天，她带着这一丝丝的无奈和遗憾，告别香港回到了上海。

## 第二节 为上海人打造的“香港传奇”

关于香港的经历，张爱玲笔下的记述不多，其中〈烬余录〉<sup>83</sup>可说是较完整的描述了她在香港的生活及体验，尤其是香港战争和沦陷时期的经历。其余皆是些零碎的文字，时而浮现二三句或一小段于某一篇文章中。但是，香港却多次成为了张爱玲笔下的主角，并造就了她好几部优秀且影响深远的作品。1942年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决定投考圣约翰大学，参加考试时却因国文不及格而需进入补习班，但两个月后她就放弃了学业。对于此事她解释是因为“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sup>84</sup>1943年5月，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出现在《紫罗兰》<sup>85</sup>复刊号上，次月又见

---

<sup>81</sup> 张爱玲：〈我看苏青〉，《余韵》，页84。

<sup>82</sup> 张爱玲：〈我看苏青〉，《余韵》，页84。

<sup>83</sup> 张爱玲于1944年所作的散文，叙述她在港战时期的经历与体验。详见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41。

<sup>84</sup>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页56。

<sup>85</sup> 《紫罗兰》是1922年由鸳鸯派代表作家周瘦鹃创办的杂志，后因故停刊，1943年5月正式复刊。取材自余斌：《张爱玲传》，页102。

〈沉香屑：第二炉香〉刊于此杂志。同年7月，〈茉莉香片〉登于《杂志》<sup>86</sup>月刊，〈心经〉则在8月发表于《万象》<sup>87</sup>月刊。

张爱玲在写小说的间隙着笔了〈到底是上海人〉一文，并于1943年8月发表于《杂志》月刊。文中她开门见山的为其香港书写设定了一个说故事的“位置”：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sup>88</sup>

此为讨论张爱玲的“上海说书人”身份必然会论及的一段“宣称式”文字。谈到香港书写，总不免会引上一句也斯语录：“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sup>89</sup>据也斯的解说，这是因为“每次说香港的故事，结果总变成关于别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说别的地方的故事，结果又总变成香港的故事。”<sup>90</sup>在如此兜兜转转、来来回回中，也斯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

---

<sup>86</sup>据余斌解说，《杂志》的背景较为复杂，属于党派刊物一类。它附属于《新中国报》，而《新中国报》的后台是日本人。然而《新中国报》报社的社长袁殊、主编鲁风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他们是利用报刊为掩护进行情报工作，所以《新中国报》还是亲日的面目。《杂志》的取径似在给日伪文化活动撑场面，除不见政经外交时局等硬性文章外，包括各种类的文字，实地报道、人物述评，以及不定期刊出的特辑、座谈会记录是其显著特色。详见余斌《张爱玲传》，页105-106。

<sup>87</sup>《万象》月刊创刊于1941年7月，前任主编陈蝶衣，后由柯灵接编。

<sup>88</sup>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页57。

<sup>89</sup>〈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为也斯其中一篇文章的篇名。详见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艺术中心，1995，页4-12。

<sup>90</sup>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香港文化》，页4。



什么位置说话。”<sup>91</sup>此番见解无疑可用于张爱玲的身上，因为她正给了自己一个说话的位置，她是以上海人的身份来“话说”香港，“察看”香港的。

关于张爱玲如何“察看”香港，如何“述说”香港，本论文于第三章及第四章将涉及探讨分析，本节主要对张爱玲所言的 7 篇“香港传奇”作一整理，原因是其中存有“货不对版”之问题。〈到底是上海人〉一文发表于 1943 年 8 月，其时张爱玲已刊出 7 篇“香港传奇”中的 3 篇，即〈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则登了一半。从她在文中如此的一段“宣告”看来，当时的她大概已经有了推出小说合集的计划，而在创作进度上也应如肖进所言：“1943 年 7 月底，〈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都已经写好，只待出手了。”<sup>92</sup>〈心经〉完整刊于《万象》月刊后，〈倾城之恋〉即于 9 月在《杂志》发表，〈琉璃瓦〉、〈封锁〉则于 11 月分别在《万象》及《天地》<sup>93</sup>发表，可见张爱玲确实是一气呵成了这些作品。

笔者所言之“货不对版”的问题在于其内容。在这 7 篇文本中，真正符合“香港传奇”这一称号的实际上仅有 4 篇，即〈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及〈倾城之恋〉，若严格来说是三篇，〈倾城之恋〉是属于上海/香港的“双城故事”，但笔者认为，它有颇大幅度涉及了香港这一背景，因此仍可以并入“香港传奇”系列。至于其余三篇，〈心经〉及

---

<sup>91</sup> 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香港文化》，页 4。

<sup>92</sup> 肖进：《旧闻新知张爱玲》，页 126。

<sup>93</sup> 《天地》是由苏青创办的刊物，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张爱玲因与苏青私交甚笃，自发表〈封锁〉起，她的稿件几乎与《天地》的寿命相始终，给稿最勤时，同一期《天地》可看到其名字出现3次以上（包括作插图、封面设计）。取材自余斌：《张爱玲传》，页108。

〈封锁〉可谓清楚言明了故事的上海背景，而〈琉璃瓦〉则为最耐人寻味的一篇。对于〈心经〉及〈封锁〉，余斌指出，“可能的解释是，她对原作做了改动”<sup>94</sup>，宋明炜亦认为是“大约后来改过，将故事挪到上海来了”<sup>95</sup>。〈心经〉与〈到底是上海人〉均发表于同一月，笔者猜想，当时的〈心经〉原稿会否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若是，就如余斌与宋明炜所言般稿子被张爱玲更改了；若不是，又似乎无人对此 7 个文本提出质疑，亦有可能是相关资料已佚失，但至今也鲜少有学者对此事进行探讨。对于〈琉璃瓦〉，笔者说它最耐人寻味，原因是它由始至终都没有论及故事的背景所在，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置于任何一个时代背景来解读，相信香港必为首选。1944 年 8 月，张爱玲首部小说集《传奇》出版，收入小说 10 篇，即〈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轻的时候〉、〈花凋〉、〈封锁〉。<sup>96</sup>笔者推断，张爱玲没有出版一部专属的“香港传奇”而改为出版了《传奇》一书，或许其中真有改动之举，当初的“香港传奇”已不能成立。本节作出如此的论述主要是在于理清这 7 篇由张爱玲“钦点”的“香港传奇”，也在于为后两章的分析工作做补充说明。

张爱玲在香港题材小说的创作并没有止步于她的“香港传奇”，1944 年发表的〈连环套〉就是以香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但未完成，所幸的是已完成的幅度可作为分析的文本。此外，其作品如〈小艾〉（1951）、〈色，戒〉

---

<sup>94</sup> 余斌：《张爱玲传》，页 110。

<sup>95</sup>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页 138。

<sup>96</sup> 本节有关于张爱玲诸作品的发表日期均取材自肖进编著：〈张爱玲年谱简编〉，《旧闻新知张爱玲》，页 109 - 155。

（1978）、〈浮花浪蕊〉（1978）、〈相见欢〉（1978），虽算不上是香港题材小说，但其中略微涉及关于香港的部分还是可作为探究的文本。

综观上述，可发现张爱玲最先完成且最早发表的三篇小说皆为“香港传奇”，这说明了香港的经历在有意无意间已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上海后，之前的所见所闻都在其意识中蠢蠢欲动，一旦下笔即写出了传奇性的佳作。

### 第三节 张爱玲的后殖民意识

欲从后殖民叙述探究张爱玲的作品，首先有必要肯定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张爱玲创作的时代与“后殖民”研究兴起的时间相隔了一段距离，考虑到将两者结合研究的可能性，本文拟就张爱玲的作品如何与后殖民叙事挂钩之问题作一探讨，阐明能否从后殖民视角解读其作品，再进一步探寻其自身的后殖民意识。

叙写香港，显然是使张爱玲的创作能与后殖民论述挂钩的主原因，因为香港本身就是殖民地文学的一个典范性场域。赵稀方在《后殖民理论》一书中指出，“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原产生于二次大战以后，大致用来指称那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sup>97</sup>他进一步据史料指出“后殖民”这个词条第一次出现于1959年，而此词条在1969和1974年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沿袭了“殖民化之

---

<sup>97</sup>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14。

后”的意思。<sup>98</sup>根据前文梳理出的张爱玲叙写香港的作品，最早的一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5月，而其创作时间必然在此之前，可见在张爱玲写作的年代，“后殖民”一词仍未出现，至于相关的研究论述肯定亦未见其影。然而，这里所言仅涉及“后殖民”一词出现的年代问题，它在定义上未有深入注解，亦无完备的理论体系，显然不能以其作为界定张爱玲文本的后殖民论述之标准。

此前所述主要从“论证式”分析张爱玲与后殖民两者结合研究的可能性，私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张爱玲自身的“后殖民意识”，它是在创作过程中影响作者的关键因素。“后殖民主义”并非一个瞬间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学术思潮，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最初的政治、军事上的殖民统治渐渐过渡、发展而来的，如陶东风言，“这个术语的准确含义必须联系此前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这两个相关概念才能得以把握。”<sup>99</sup>。笔者认为，张爱玲作品的后殖民叙事或其后殖民意识就如同这一个学术思潮的脉络，它是从对“殖民主义”的触及及体验延伸而来的。所谓的“后殖民意识”，大致等同于个人或文学对于一个殖民地的境遇所拥有的敏感度。赵稀方曾针对早期香港文学的后殖民视野作出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初时的香港文学对于殖民地境遇的敏感度是极低的，大多涉及下层社会和爱情婚姻的题材，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殖民地

---

<sup>98</sup> 文中言赵稀方所根据之史料取自米什拉（Vijay Mishra）和霍奇（Bob Hodge）的《什么是后殖民主义》（What is Post (-) colonialism?）。

<sup>99</sup> 陶东风：《后殖民主义》，页1。

隐含的一些殖民性问题。<sup>100</sup>然而，他进一步言明了张爱玲自身所持有的一种后殖民意识：

意识不到并不等于没有，幸而有了感觉力和表现力都堪称一流的张爱玲，她在 1938-1942 旅居香港读书，并在回国后以小说形式写下了她的感受，如此我们才能得以窥见二十世纪上半期香港殖民地面貌的一斑。<sup>101</sup>

张爱玲后殖民意识的形成主要还是取决于她在香港的耳闻目睹。我们不能否认张爱玲在感知、思考上的独特之处，甚至是过人之处，也不能完全否认她具有对于“后殖民”的一种自觉性意识，但相对于自觉性，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她自身的经历和体验。王瑞华有如下的一番见解：

……尽管张爱玲所生活的年代，“后殖民”这个词还没出现，但作为一个忠于现实，并对现实有着很强的表现力的杰出作家，她真实的叙写、呈现了中国少女在香港被迫沦落的悲惨事实（〈沉香屑：第一炉香〉），这就在同时，于无意当中戳穿了殖民者建立在自我种族优越基础上对东方殖民地的侮辱性的臆想。这种后殖民意识，并非她的先知先觉，而是殖民地香港的现实情况如此，是历史现实本身显示了殖民者建立在主观想象基础上的“东方主义”的子虚乌有。<sup>102</sup>

---

<sup>100</sup> 详见赵稀方：〈历史的放逐——香港文学的后殖民解读〉，《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页77-83。

<sup>101</sup> 赵稀方：〈历史的放逐——香港文学的后殖民解读〉，页81。

<sup>102</sup> 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页284。

这种后殖民意识实际上是她从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积淀而成的，即便她说“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sup>103</sup>，但正是这些不相干的事情使她拥有了许多切身具体的经验，让她将自己的感受移植到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身上，从而令我们看到其作品中的“真实”。本节仅就张爱玲与后殖民研究的关系作一简要阐明，笔者相信，欲探寻张爱玲的后殖民意识，关键之举在于分析解读其作品，而这一个工作将于接下来的章节进行。

---

<sup>103</sup> 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42。

## 第四章 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

张爱玲在回忆起初时见到香港的海的时候，让她联想到的是“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sup>104</sup>。葛薇龙眼中的香港则是：“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sup>105</sup>而白流苏在抵港时看见的是“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甯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sup>106</sup>这三者眼中的香港皆属于色彩强烈且带点“夸张成分”的都市，然而在这么一个都市内里呈现的又是什么面貌呢？本章以张爱玲的香港题材小说为探讨对象，试图呈现出张爱玲笔下的后殖民都市图像。

### 第一节 作为一个“被看”的“他者”

在主导者的话语中（尤其是殖民话语），主导者总是把与其相对的“他者”（the other）置于一种“缺乏”、“沉默”、“非正统”、“低下”、“堕落”等的语言表述中，籍以建构主导者的自我优越性。<sup>107</sup>萨义德曾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

---

<sup>104</sup> 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流言》，页 99。

<sup>105</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6。

<sup>106</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202。

<sup>107</sup> 转引自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2004，页 68。

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sup>108</sup>，作为殖民地，香港就是为了满足西方殖民者而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他者”。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以上海人自居的张爱玲，香港在她的眼中无疑也是一个“他者”，而透过她的文本，我们看到的香港就具有了一个“双重他者”的身份。张爱玲在她第一篇发表的香港题材小说中就描绘了香港的“他者”形象：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地下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sup>109</sup>

这是〈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人公葛薇龙的姑母——梁太太的家，张爱玲形容它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隐约透露出这个房子存有的一个“被看”的身份。这个房子还呈现出一副“中西混拼”的模样，有仿古的设计，又配上“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概念，更引人注目的是，那特意安排的“中国特色”，显然是梁太太自制的“东方主义”。

<sup>108</sup>[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页1。

<sup>109</sup>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6。



小说紧接着就对葛薇龙的衣着打扮作一段描叙：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sup>110</sup>

女学生的这种装束同样隐含着一个被看的“他者”身份。周蕾曾有一篇讨论《末代皇帝》<sup>111</sup>这部电影的文章，文中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西方人最喜爱的“中国”其实并不包括现代中国人，因为中国已经“西化”或“现代化”了，它抹杀了“成长在二十世纪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实。<sup>112</sup>葛薇龙被设计的这种“名妓打扮”无疑像周蕾所言，是源于西方人本身持有的一种“东方性想象”，他们以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来定位这个属于中国领土的香港的身份，而这种定格式的理解实际上更趋向于扭曲的一面，形成一种不符传统伦理道德的现象：现代女学生化身清末名妓。

《红楼梦》所涉及的研究中较有趣的就属人名谐音的隐意探讨，而形容自己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魔名”<sup>113</sup>的张爱玲在其作品中也像曹雪芹般对人名做了一番讽刺。“睨”，有斜着眼睛看之意，“睇”，也有斜着眼看

---

<sup>110</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6。

<sup>111</sup> 《末代皇帝》是一部由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特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电影，讲述的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故事，上映于1987年。

<sup>112</sup> 详见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3。

<sup>113</sup> 此为张爱玲在《红楼梦魔》的〈自序〉末尾题的诗句，她形容自己对于《红楼梦》的考据工作是“一种疯狂”的情形。详见张爱玲：〈自序〉，《红楼梦魔》，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页5。

的含义，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出现了两个名为“睨儿”及“睇睇”的人物。睨儿和睇睇是梁太太家的女仆，但实际上是她用以诱感情人的“工具”，是名副其实“被看”的“他者”。

在〈倾城之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如同葛薇龙遭遇的情况，这一次是香港饭店里工作的男仆：

柳原笑道：“香港饭店，是我所见过的顶古板的舞场。建筑、灯光、布置、乐队，都是老英国式，四五十年前顶时髦的玩意儿，现在可不够刺激了。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样的西崽，大热的天，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袴——”流苏道：“为什么？”柳原道：“中国情调呀！”<sup>114</sup>

在英属殖民地的香港，这些中国“传统的旧有物”总是被刻意的展示出来，以赢取殖民者的欢心，满足他们对神秘东方的猎奇和窥视欲望。<sup>115</sup>这种现象不仅让香港人丧失自身的文化，更可悲的是他们必须接受一种“英国式的中国文化”，须维持一种浪漫、神秘的“异国情调”，以满足作为“看者”的英国人建构香港——或可说是西方人建构中国形象的需求。然而，为何只有这些中国传统的“旧有物”、“旧形象”才能满足英国人的需求？以及作为取悦欧美人的手段？

---

<sup>114</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205。

<sup>115</sup> 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页263。

鲁迅的文章曾提及，1927年港督金文泰在“督轶茶会”上亲自发表演说，倡导中国国故。对此王宏志指出，“从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对港英政府造成沉重的损失，因此，在事件平息后英廷决定委任深谙中文，熟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金文泰为总督，希望能够避免同类事件出现。金文泰的策略是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以抗击新文化运动以来那种比较激烈的国家主义思想，从而使香港年轻一代更愿意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sup>116</sup>换言之，这是殖民者用以巩固势力的一项政策。其次，作为殖民者，英国必然是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而被殖民者显然就是与其对应的弱者、卑劣的“他者”，他们必须作为大英帝国那种“自我优越意识”的对比，从而显示出殖民宗主国的强大势力。

这个“被看”的程度还进一步强化至“被凝视”的状态，呈现在张爱玲的另一篇香港故事〈连环套〉中：

她探身到他跟前，柔声痛哭道：“比尔！”汤姆生两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记得她是谁。霓喜忽然觉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唧唧地抵着写字台，觉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穿得过于花哨，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汤姆生的世界是浅灰色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浮雕变了石像，高高突出双乳与下身。她嫌她自己整个地太大，太触目。汤姆生即可意会到她的这种感觉，她在他面前蓦地萎缩下去，失去了从前吸引他的那种悍然的美……他感到安全，签了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说道：“这是你的，只要你答应你从今以后不再看见我。”<sup>117</sup>

<sup>116</sup>转引自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页264。

<sup>117</sup>张爱玲：〈连环套〉，《张看》，77。

“凝视”的本义为专注地看或聚精会神地看，但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凝视”（gaze）就带有一种居高临下地看或俯视的意味，通常会与种族、性别、阶级等身份地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于“男性凝视”，黄海荣〈“男性凝视与色情”〉一文指出它“是一种性别化的观看权力，也是一种运用权力控制（女人）的方式。‘男性凝视’的基本论调是：男人观看，而女人就是被观看被控制的对象，而男人从观看中得到快感。这一种的观看形式，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现。”<sup>118</sup>故事的霓喜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然而在当她处于汤姆生的凝视之下时，她似乎自觉性的发现并且承认了自己的下等人身份，更顿时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种种缺陷，所以她在意识上开始有退缩的举动。在这里，霓喜就是被殖民者的代表，而汤姆生就是殖民者的代表，在如此的一个“凝视”场面中，可以发现被殖民者展现的一种对自身低等位置的默认，而殖民者就以对方这种“默认”来认同自己的身份。

殖民者这种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香港的发展历史上是极为明显的，像前文提及的早年港府所实行的华洋分隔政策，体现于世人眼前的实际上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态度。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就切身感受到了身为黄种人所遭受的歧视。当睨儿劝她趁着交际的机会，挑一个合适的人时，她冷笑道：

姑妈这一帮朋友里，有什么人？不是浮滑的舞男似的年轻人，就是三宫六嫔的老爷。再不然，就是英国兵。中尉以上的军官，也还不愿意同黄种人打交道

---

<sup>118</sup>黄海荣：〈“男性凝视”与色情〉，《文化研究@岭南》，2007年7月第6期，页1。

呢！这就是香港！<sup>119</sup>

这个布满了种族歧视风气的地带，对周吉婕这位“联合国混血儿”而言同样是一个生存的困境：

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就是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这个年头儿，谁是那么个罗曼蒂克的傻子？……这儿殖民地的空气太浓厚了；换个地方，种族的界限该不会这么严吧？<sup>120</sup>

可见周吉婕的混血儿身份在寻求对象上的尴尬处境，而她的这一番话正说出了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地位悬殊，殖民者的这种阶级和种族观念无疑加深了潜藏于被殖民者心中的自卑感和作为“他者”的痛苦。

在张爱玲的笔下，香港就是如此的一个“被看”的“他者”，也是一个没有能力反抗的“他者”，像葛薇龙身穿的赛金花装束，饭店男仆的北方人扎脚裤，都是一味的“遵照”这些由殖民者赋予他们的“东方形象”，展现出来的无疑是殖民者的“文化殖民”策略。

---

<sup>119</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6。

<sup>120</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60-61。

## 第二节 “避难之城”与“欲望之都”的形象

香港自开埠以来，人数不断上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难民的涌入。近代中国的局势动荡不安，一连串的战乱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抗战、内战等，均导致内地的人们纷纷逃难到香港，而这一些避难的情况在张爱玲的文本中亦能找到一丝一点的痕迹。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和她的家人就是因为日本侵华而来到了香港避难：

两年前，因为上海传说要有战事，我们一家大小避到香港来，我就进了这儿的南英中学。<sup>121</sup>

这些逃难到香港的人还包括了商人，有的甚至将所经营的生意全盘移至香港，如〈相见欢〉及〈小艾〉中描述的情形：

……战后的香港畸形繁荣，因为闹共产党，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伍先生企业公司也搬去了。<sup>122</sup>

……（金槐）匆匆的跑到阁楼上，向小艾说道：“我们那印刷所要搬到香港去了，工人要是愿意跟着去，就在这两天里头就要动身。”……金槐是很兴奋，自从上海成了孤岛，虽然许多人还存着苟安的心理，有志气些的人都到内地去

<sup>121</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41。

<sup>122</sup> 张爱玲：〈相见欢〉，《惘然记》，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页 69。

了，金槐也未尝不想去，不过在他的地位，当然是不可能。到香港去，那边的环境总比这里要好些。<sup>123</sup>

再如〈色，戒〉中描写的：“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虽然同学多数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有这么几个最谈得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sup>124</sup>除了经商的公司，大学也因为战争而迁至香港，张爱玲如此的安排无形中揭露了香港人与这群来自的内地的学生的强烈对比，一个是冷漠以对，一个是义愤填膺，文中张爱玲还不忘作了一番讽刺：香港是“没有国家思想”<sup>125</sup>的地方。

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个避难之城还延伸成为那群“无处可去”的人所选择的栖身之所。像〈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太太：

……她母亲蜜秋儿太太早年就守了寡，没有能力带她的三个女儿回国去。在香港这一隅之地，可能的丈夫不多；罗杰，这安静而平凡的独身汉，也是不可轻视的。<sup>126</sup>

同在这个故事里的罗杰安白登，因为被误认为色情狂而受尽舆论的压迫，当他急于要离开香港时，却赫然发现这个被他所鄙视的城市竟是他唯一的“家”：

他离开香港了——香港，昨天他称呼它为一个阴湿、郁热、异邦人的小城；

---

<sup>123</sup> 张爱玲：〈小艾〉，《余韵》，页 189。

<sup>124</sup> 张爱玲：〈色，戒〉，《惘然记》，页 18。

<sup>125</sup> 张爱玲：〈色，戒〉，《惘然记》，页 18。

<sup>126</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90。

今天他知道它是他唯一的故乡。<sup>127</sup>

香港在这些特殊时期扮演着避难地的角色，首要原因在于其殖民地身份。作为割让予英国的土地，香港受到中国动荡局势的影响自然相对的小，而香港这一个“弹丸之地”只是英国人作为商业用途的地带，英政府对于华裔之事也一概不干预，此地无疑成为了难民用以栖身的地方。其次，香港在地理上距离大陆甚近，聚居于此的大部分是华裔，在环境、生活习惯以至沟通方面皆不成问题。作为避难之地的香港，在意义和社会价值上可说是属于正面的，它在 20 世纪扮演的这个角色无形中隐藏一种“救赎”的含义。

在张爱玲的文本中，与“避难之都”的角色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作为“欲望之城”的香港。葛薇龙，起初来到姑母家的她认为只要自己“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sup>128</sup>然而姑母家灯红酒绿的生活，加上一个混血儿乔琪乔，她彻底的改变了。

薇龙闭上了眼睛。啊，乔琪！有一天他会需要她的，那时候，她生活在另一个家庭的狭小的范围里太久了；为了适应环境，她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入了生活的栅栏里，拔也拔不出。那时候，他再要她回来，太晚了。她突然决定不走了——无论怎样不走。<sup>129</sup>

---

<sup>127</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5。

<sup>128</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44。

<sup>129</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80。



在一个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国家，葛薇龙是意识到自己作为黄种人的卑劣地位，她也深知她爱的人根本无法给她幸福，然而欲望的作祟让她到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成为那个“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sup>130</sup>的人。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决意来到香港争取范柳元，这个殖民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刺激、犯冲的色彩，让流苏摆脱了上海的封建枷锁，更无形中激起了她身上的欲望：

流苏慢腾腾摘下了发网，把头发一搅，搅乱了，夹叉叮铃当啷掉下地来。她又戴上网子，把那发网的梢头狠狠的衔在嘴里，拧着眉毛，蹲下身去把夹叉一只一只捡了起来。柳原已经光着脚走到她后面，一只手搁在她头上，把她的脸倒扳了过来，吻她的嘴。发网滑下地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调；他也想到过，她也顾虑到那可能性。然而两方面都是精明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走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了，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sup>131</sup>

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无形中被视为一个远离传统封建的地带，它的繁华，文化杂糅也为它建立了一个“欲望都市”的形象，张爱玲或许正看中了这一点，把一些不能在上海发生的事移植到了香港，诚如李欧梵所说：“在上海的现实

<sup>130</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82。

<sup>131</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页 220。

中不能发生的事，特别是关于性和欲望方面的事，都可以在香港发生，因为香港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它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充满了异国情调。”<sup>132</sup>

### 第三节 从上海到香港：新生抑或延续？

前文提及，近代中国时局的动荡致使大规模人群避难至香港，甚至是移居香港，而在迁徙的过程中，那积习深厚的中国封建文化及旧式的生活形式也随之一并置入，与作为现代社会代表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碰撞、融合。张爱玲的小说通过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人物，揭露了这种中西、新旧文化交锋的形态下所展现的种种现象。

〈茉莉香片〉讲述的就是一个生活于香港但居于旧式封建家庭中的男孩——聂传庆的故事。

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sup>133</sup>

屋子里面，黑沉沉的穿堂，只看见那朱漆楼梯的扶手上，一线流光，回环曲折，远远的上去了。<sup>134</sup>

---

<sup>132</sup> 李欧梵：《苍凉与事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99。

<sup>133</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10。

<sup>134</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10。

满屋子雾腾腾的，是隔壁飘过来的鸦片烟香。他生在这空气里，长在这空气里，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闻了这气味就一阵阵的发晕，只想呕。<sup>135</sup>

这就是聂传庆的家，一个阴冷灰暗且弥漫着鸦片烟味的家，满院凋零的花木似乎说出了这个家庭的腐朽、没落。传庆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个遗少型人物，终日与他的后母沉迷在鸦片烟中，给他的就只有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sup>136</sup>

……（传庆）身子向前伛偻着，一只手握着鞋带的尖端的小铁管，在皮鞋上轻刮着。他父亲在烟炕上翻过身来，捏着一卷报纸，在他颈子上刷地敲了一下，喝道：“一双手，闲着没事干，就会糟蹋东西！”<sup>137</sup>

肉体的伤害对传庆来说还不算什么，更甚的是精神上的摧残。父亲对于他从来就没有一句赞赏的话，不是说他“跷脚驴子跟马跑，跑折了腿，也是空的！”<sup>138</sup>就是嫌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sup>139</sup>，而后母总是充当“帮凶”，附和着父亲对他冷嘲热讽，煽风点火。这种日积月累的精神折磨于无形中造成他心灵的严重扭曲与畸形发展，他的思想及行为也因此变得怪异。

---

<sup>135</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2-13。

<sup>136</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7。

<sup>137</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

<sup>138</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

<sup>139</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12。

父爱的严重缺乏致使他把理想父亲的形象投射于母亲曾经的恋爱对象——言子夜教授身上。他发现父母亲的婚姻是没有爱的，而他就成为了这种封建包办的婚姻的牺牲品。对言教授的爱慕令他开始憎恨教授的女儿言丹朱。言丹朱的形象是健康、开放、深受朋友喜欢的女孩，与聂传庆形成对比，亦显示出新旧文化生活的差异。终日对言教授的幻想使聂传庆处于惶惑不安中，也影响了他的学业，最后更令言教授大动肝火，公然将他从课堂轰了出去，使他悲痛万分。这件事没有令他厌恶言子夜，“他不要报复，只要一点爱——尤其是言家的人的爱。既然言家和他没有血统关系，那么，就是婚姻关系也行。无论如何，他要和言家有一点联系。”<sup>140</sup>于是，他向言丹朱展开追求：

他紧紧抓住了铁栏杆，仿佛那就是她的手，热烈地说道：“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sup>141</sup>

传庆的告白透露了他最深切的渴望，丹朱俨然成为拯救他的“神”。然而，言丹朱没有接受他的爱意，这让他寻找理想父亲的希望破灭，期望从中得到的新生活也被摧毁，最终引发了他身上潜藏的蛮暴的激情，他像疯了一样对丹朱施暴。

---

<sup>140</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26。

<sup>141</sup> 张爱玲：〈茉莉香片〉，《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27。

对聂传庆来说，言丹朱与言子夜父女隐喻着理想生活的救赎意义。<sup>142</sup>他的家明显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即便已迁至香港，封建的生活方式却仍维系着，父亲的冷酷无情更使他的心灵深受创伤进而遭到扭曲。从封建积习深厚的家走出来的他，面对着现代社会的新气息，他渴望得到新的生活却无法得到，想逃脱旧式生活的枷锁又无从逃脱，最后令他彻底崩溃，这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弊端在现代社会冲击下的反映。文末的一句“他跑不了”似乎隐含着传庆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枷锁的命运。

聂传庆在香港的这一个家就等同于《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在上海的家，皆为中国旧社会的封建家庭。故事是这么形容白公馆的：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sup>143</sup>

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一样的单调与无聊。<sup>144</sup>

流苏就是在这一个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家庭里生活着，加上她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这个家里除了面对这种一成不变的乏味生活，还须受尽他人的白眼。

---

<sup>142</sup> 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页 284。

<sup>143</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页 188。

<sup>144</sup> 张爱玲：《倾城之恋》，《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页 195。

这种封闭的生活无形中对她造成压抑，使她希望冲出这个沉闷的环境，找寻新的气息，这是促使她选择出走香港的主要原因。香港的现代都会气息令流苏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她更勇于追求自己所想，和范柳元进行了一场“恋爱角逐”。

香港在张爱玲的笔下成为了一个新旧文化并立的城市，然而这也是真实的香港。如前所述，香港的文化是属于“移植性”的，是由内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英殖民的西方文化结合而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一些腐朽封建文化也移植到了这个地方。白流苏在摆脱旧式生活的追求上获得了胜利，香港对她而言是一个重生，而聂传庆则相反，他始终无法摆脱这一个牵绊着他的“恶梦”，香港的一切只不过是延续着过往的生活。当然，传庆面对的是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就像他的宅院稳固的建在香港的土地上，流苏则是只身从封建家庭的逃脱，从中可见在张爱玲笔下，这种旧式生活、封建文化传统的病态。从中亦可看见香港对于那群来自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们，可以是一个“新生”之地，也可以是一个“延续旧路”之地。

## 第五章 另一幅图像：张爱玲笔下驻留香港的白人社会

在殖民统治框架下，香港被定型为“被看”的“他者”，而作为殖民者的英国自然持有相对的“看者”身份。张爱玲的香港小说也将焦点投注到英国白人社会中，由白人担任主角，然而在其笔下，这个作为殖民者后裔的白人社会，展露的不是作为上层阶级的优越姿态，而是愚昧、悲哀的一面。本章拟就张爱玲涉及香港白种人社会的文本进行探究，窥睹这一族裔在其笔下的面貌。

### 第一节 白人社会对“性话语”的封闭

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中，东方总是那么的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诡，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的象征。<sup>145</sup>弱者身份的加诸，自卑心理无形中在东方人身上滋长，从而形成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对西方“自我”身份的认同，肯定其权威、优越的地位。然而，在张爱玲的文本中，英国人的这种高尚形象似乎被扭转了，且看〈沉香屑：第二炉香〉的开端“我”和一位爱尔兰女孩克荔门婷的对话：

她翻弄着书，假装不介意的样子，用说笑话的口气说道：“我姊姊昨天给了我一些性教育。”我说：“是吗？”克荔门婷道：“是的。……我说，真是……不可能的！”除了望着她微笑之外，似乎没有第二种适当的反应。对于性爱公开地表示兴趣的现代女孩子很多很多，但是我诧异克荔门婷今天和我谈论到这个，因为她同我还是顶生疏的朋友。她跟下去说：“我真吓了一跳！你觉得么？一个

---

<sup>145</sup> 陶东风：《后殖民主义》，页 79。

人有了这种知识之后，根本不能够谈恋爱。一切美的幻想全毁了！现实是这么污秽！”我做出漠然的样子说：“我很奇怪，你知道得这么晚！”她是十九岁。我又说：“多数的中国女孩子们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一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sup>146</sup>

在克荔门婷和“我”的对话内容中明显出现了一个“身份对调”的情况。作为白人代表的克荔门婷竟然对性知识显得如此匮乏，反之“我”却是一派漠然且带有鄙视的口气来回应她的无知，显示出东方人也不全然处于落后、低等的位置。然而，克荔门婷只是一个“引子”，一个悲哀的故事才正要开始。

〈沉香屑：第二炉香〉将聚焦点置于香港的英国社会，讲述了一个英国人罗杰安白登的故事。罗杰只是这个英国社会里的一个普通人，年届四十，职业是大学教授，然而他的生活却在娶了一个缺乏性教育的女孩——愫细蜜秋儿之后变得极不普通。新婚之夜，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的愫细惊慌失措的逃跑，后来躲到了学生宿舍去求助，她和罗杰的事情自此引起了轩然大波。

（学生）内中有一个提议道：“安白登先生不知道哪儿去了？我们去把他找来。”愫细听了，脸也青了，把牙一咬，顿脚道：“谁敢去找他？”没有人回答。她又提高了喉咙尖叫道：“谁敢去找他？”大家沉默了一会，有一个学生说道：“安白登太太，您要原谅我们不知道里面的细情，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处置……”愫细把脸埋在帐子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道：“我求你们不要问我……”

---

<sup>146</sup>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88-89。



我求你们！但是，你们得答应我别去找他。我不愿意见他；我受不了。他是个畜生！”<sup>147</sup>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重演了愫细姐姐靡丽笙和她的丈夫弗兰克丁贝的故事：

靡丽笙的婚姻是不幸的，传说那男子是个反常的禽兽，靡丽笙很快的离了婚。<sup>148</sup>

靡丽笙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而对男性产生了偏见，愫细的婚姻大概勾起了她不好的回忆，她害怕愫细会遭遇相同的事，所以百般的告诫罗杰：

靡丽笙突然扳住了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捧住了脸，呜咽地说道：“罗杰，请你好好的当心愫细！”罗杰微笑道：“你放心，我爱她，我不会不当心她的！”

<sup>149</sup>

靡丽笙抬起头来，睁开了一双空落落的蓝灰的大眼睛，入了迷似地凝视着地上的电风扇，断断续续说道：“你爱她……我的丈夫也是爱我的，但是他……他待我……他待我的态度，比禽兽……还不如！他简直不拿我当人看，因为……他说是因为他爱我……”<sup>150</sup>

---

<sup>147</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03。

<sup>148</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90-91。

<sup>149</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95。

<sup>150</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95-96。

故事的最后，罗杰和靡丽笙丈夫的结局一样，在舆论和压迫下选择了自我了结。对于愫细的西方人身份，一般人都会认为她在思想上是较为开放的，然而她却浑然不懂关于性方面的知识，这无疑是对西方国家所标榜的高等文明的一大讽刺，甚至瓦解了东方人附着于西方人身上的进步、开放等等的“自我”价值观。

对于愫细这一人物的塑造，我们或许可以从张爱玲的散文找出端倪。在〈谈跳舞〉一文她曾提及一个个性与愫细有几分相似的华侨姑娘：

从另一个市镇来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那却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她大哥在香港大学读书，设法把她也带出来进大学。打仗的时候她哥哥嘱托炎樱与我多多照顾她，说：“月女是非常天真的女孩子。”她常常想到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sup>151</sup>

从月女的身上，张爱玲看出了她的空虚，看到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背景，没有传统。”<sup>152</sup>愫细和靡丽笙在身份上也算是外侨，若把张爱玲所言的“在思想上的无家可归”来看待她们亦未为不可。居于香港，自身文化传统的缺失必然会造成她们在思想上的空虚、断层，从而影响她们的思维模式，使她们对于“性话语”这类较敏感的问题显得却步。

---

<sup>151</sup>关于月女的描述详见张爱玲：〈谈跳舞〉，《流言》，页187-189。

<sup>152</sup>张爱玲：〈谈跳舞〉，《流言》，页189。

## 第二节 白人社会的冷漠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悲剧的酿成还来自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那是一股无形的杀人舆论。罗杰与愫细夫妻之间的私生活瞬间成为了众人的话题，流言蜚语四起，罗杰在众人眼里俨然已成了色情狂。

他们目前注意的焦点，便是安白登的下落，有的说他一定是没脸见人，躲了起来；有的说他是到湾仔去找能够使他满足的女人去了；有的说他隐伏在下意识内的神经病发作了；因为神经病患者的初期病症之一，往往是色情狂。<sup>153</sup>

在属于同一族裔的白人社会里，罗杰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可怖的是，他惊觉自己处于了百口莫辩的状况：

就连对于最亲爱的朋友，譬如巴克，他也没有法子解释那误会。至于其他的人，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对于那些人，他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人，男的像一只一只白铁小闹钟，按着时候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脑筋里除了钟摆的滴嗒之外什么都没有；也许因为东方炎热的气候的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一架钟。女的，成天的结绒线，茸茸的毛脸也像是拉毛的绒线衫……他能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的家庭教育的缺陷么？罗杰自己喜欢做一个普通的人。现在，环境逼迫他，把他推到大众的圈子外面去了，他才感觉到圈子里面的愚蠢——愚蠢的残忍……圈子外面又何尝不可怕？<sup>154</sup>

<sup>153</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06。

<sup>154</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4。

罗杰面临的状况似乎令他成为了一个“他者”，一个被“孤立”的人，自己既不在大众的圈子里面，也不在圈子外面。张爱玲于此借用罗杰刻画了白种人的社会形态，显示了他们的负面形象，并无所谓的高尚、理性。

不屑于他的学生在背后公然的嘲笑他，一起工作的教职员则出于忌讳，避免了许许多多的话题，他们深怕在聊起某个话题时那“一两个脾气燥的老头子会气喘吁吁地奉劝大家不要忘了维持白种人在殖民地应有的声望”<sup>155</sup>，最后他们变成无话可说。最让他无法忍耐的，是一般女人对他的态度：“女秘书，女打字员，女学生，教职员的太太们，一个个睁着牛一般的愚笨而温柔的大眼睛望着他，把脸吓得一红一白，怕他的不健康的下意识突然发作，使他做出一些不该作的事来。”但是，她们在鄙视他，憎恶他的同时却“畏畏缩缩地喜欢一切犯罪的人，残暴的，野蛮的，原始的男性。”<sup>156</sup>

罗杰正在往来奔驰着，忽然觉得球场外麦菲生太太身边多了一个女人，把手搭在眉毛上，凝神看着他，一面看一面对麦菲生太太说一些话，笑得直不起腰来。麦菲生太太有些局促不安的样子。他觉得他自己是动物园里的一头兽。<sup>157</sup>

在网球场上出现的这个“凝视”他的女人是哆玲姐，一个“带有犹太血液的英国人”<sup>158</sup>。此时的罗杰就像一个来自东方的“他者”，遭到白人的审视，而且还是一个算不上“纯种”的白人，更是一个女人。在她的凝视下，罗杰觉得自己像一头野兽，这说明了他本身的自卑感，就如前文所述的霓喜，在一个强者

<sup>155</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8。

<sup>156</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8。

<sup>157</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9。

<sup>158</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9。

面前，他认同了自己的低等身份，觉得自己身上满是缺陷。哆玲姐随即对他展开挑逗，又一个“凝视”的画面出现：

她终于支撑着翻过身来，坐在地上，把头枕在沙发沿上，抬起脸来凝视着他。在这昏暗的角落里，她的润泽的脸庞上，眉眼口鼻的轮廓反都镀上了一道光，像夜明表。她用她那微带沙哑的喉咙低低说道：“不要把你自己压制得太厉害呀，我劝你！”<sup>159</sup>

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女性凝视”，哆玲姐对罗杰明显存有鄙视的态度，在她的凝视下更可看出一种想要支配他人的欲望，而罗杰就成了她的对比，反映出他剩下的一个极为卑微的身份。

天真的纤细，人言的可畏，加上这个社会老是强调的“白种人该有的声望”，这种种无形的压迫，罗杰最终选择自杀了解生命。

他把煤气关了，又关了门，上了门，然后重新开了煤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擦火柴点上火。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地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sup>160</sup>

从罗杰安白登的身上，隐约可以看到张爱玲的一位教授的影子，就是那位历史教授——佛郎士。佛郎士在战争期间被征入伍，有一天黄昏因为在思索着什么而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开了枪，所以张爱玲说他的死是“最无名目

<sup>159</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23。

<sup>160</sup> 张爱玲：〈沉香屑：第二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页 119。

的死”。张爱玲是喜欢这位教授的，她认为教授“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从他那里还可以“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而正因为喜欢，她对他的死十分感慨：“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sup>161</sup>回看罗杰安白登，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也是被自己人“置于死地”的。或许从佛郎士的身上，张爱玲感受到了即使是白人，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从小说中对罗杰的描述，也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一个白人存有的同情，如蔡源煌所言：“在她笔下，那个时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受害的程度虽不同，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sup>162</sup>

---

<sup>161</sup> 本文关于佛郎士教授的描述取材于〈烬余录〉一文。详见张爱玲：〈烬余录〉，《流言》，页 45-46。

<sup>162</sup> 蔡源煌著，杨泽主编：〈从后殖民主意的观点看张爱玲〉，《阅读张爱玲：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285。

## 结论

综观上述，可发现张爱玲的香港书写所关注的不仅是被殖民者抑或黄种人，她同时也将焦点投放在香港的白人社会中，揭示白人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香港，在张爱玲的笔下，是一个“双重他者”，是一个避难之都，更是一个欲望之城。对于上海人而言，它或许是一个重获“新生”之地，但也可能是一个延续封建思想的地带。换另一个角度，香港的白人故事，张爱玲写的不是他们优越的身份地位，而是他们愚昧的，但也是悲哀的一面。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的点题似乎给香港下了一个定义——一个华美但悲哀的城，而她的叙写香港的作品似乎也都贯穿着一种华美与悲哀的基调。这一个分明、强烈的对比，正好述说了她的每一个香港故事。华美，不外乎是指香港绚丽繁华的景象，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一份美好终究不能持久，它很快的会转变成一种悲哀、无奈的生命情境，而这就是人生。通过张爱玲的香港题材小说，可以发现，她所谓的这份悲哀主要是来自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身份。基于殖民地的身份，生活在香港的华人总是处于低等的地位，被排挤、被打压，为了满足殖民者的“东方主义”视野，华人更被当成“玩具”般供他们欣赏，像葛薇龙身穿的校服。悲哀其实也源自积习深厚的中国封建文化，透过聂传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封建思想在移入香港后的继续衍生所带来的后果。华美但悲哀，往深一层看，就是张爱玲对香港以及居留于此的人的一种人生阐释

<sup>163</sup>。

---

<sup>163</sup>此观点参考自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页 224-225。

在张爱玲叙写香港的小说中，处处可以窥见香港的缩影。像梁太太那个“中西混拼”的房子，其实就隐喻着香港这一个中西杂糅的城市，她家中的中国摆设、葛薇龙的学生装束，流苏遇见的西崽装扮，实际上都代表着香港的形象——一个“被看”的“他者”。作为避难地的香港从特定意义来说是具有其价值的，但“欲望之城”的形象又给了它一个负面的价值。同样的，对于上海人，它可以成为拯救他们的“新生”之地，但又可以将他们“归回原处”，延续封建的文化传统。

总的来说，从后殖民论述解读张爱玲笔下的香港，我们看到了香港从表至内的身份形象，也看到了从被殖民者到殖民者的人生百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价值就是重新唤起对于殖民历史的记忆，<sup>164</sup>从而更好的了解过去，重塑自己的身份。以后殖民视角解读张爱玲的香港题材小说，希望我们在得以窥见特定时代的香港面貌之余，也能重新开启过去的回忆，重塑自我，进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

<sup>164</sup>陶东风：《后殖民主义》，页9。



## 参考书目

1. [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陈天权：《香港历史系列——穿梭今昔 重拾记忆》，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4. [英]弗兰克·韦尔什著，[中国]王皖强、黄亚红译：《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 by Frank Welsh,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93），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
5. 高添强：《香港今昔》新版，香港：三联书店，2007。
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7. 李欧梵：《苍凉与事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8. 乔还田、晋平：《国门破毁之始：南京条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9. 陶东风：《后殖民主义》，台北：扬智文化，2000。
10.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出版，1998。
11. 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1997。
12. 王瑞华：《殖民与先锋：中国痛苦——三位女性对香港的文学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14.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5. 肖进：《旧闻新知张爱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6.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2004。
17. 杨泽 编：《阅读张爱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麦田出版，1999。
18. 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艺术中心，1995。
19. 余斌：《张爱玲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 张爱玲：《第一炉香——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二》，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
21. 张爱玲：《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
22. 张爱玲：《红楼梦魇》，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23. 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
24.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之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
25. 张爱玲：《惘然记》，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
26. 张爱玲：《余韵》，香港：皇冠出版社，2000。
27. 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

28.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9. 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30.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1. 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
32.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3.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参考期刊

1. 程悦：〈他者之城：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传奇”〉，《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
2. 程悦：〈再生之城：完不了的“香港故事”——试论张爱玲与施叔青笔下的香港传奇〉，《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卷第3期。
3. 龚文华：《后殖民批评视阈中的张爱玲》，武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4. 黄海荣：〈“男性凝视”与色情〉，《文化研究@岭南》，2007年7月第6期。

5. 梁秉钧：〈两类型的殖民论述：黄谷柳与张爱玲笔下四十年代的香港〉，《作家》2003年第22期。
6. 赵稀方：〈历史的放逐——香港文学的后殖民解读〉，《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 英文期刊

Hsiu-Chuang Deppman, Rewriting Colonial Encounters: Eileen Chang and Somerset Maugham. *Jouvert*, 5(12). Retrived from <http://english.chass.ncsu.edu/jouvert/v5i2/hcdepp.htm>